

# 穿越时空的城市轨迹

## ——西方人笔下的晚清云南城市

胡昊苏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晚清时期,在云南游历、考察的西方人留下了大量文字,从中可以发现有关云南城市规模、职能、分布、形态变迁的轨迹。晚清的云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城市体系,由于开埠通商,城市的经济职能得到强化,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体现出近代化和外向型的特征。

**关键词:**晚清;西人著述;云南城市;时空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3-0160-06

1840年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军人、商人、工程师、大学教授进入云南游历考察,收集云南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报,调查云南山川、河谷、平坝、民族、宗教分布的情况,其来源国以英法两国为主。他们留下的内容丰富的报告、笔记、书札、文章近些年日益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其中一些已经翻译出版,一些逐渐被挖掘整理出来。由于写作习惯、思路、兴趣点、目的迥异,较之我国的方志、地志,他们的记录较重视第一手材料的获得和个人的直观感受,较多地使用数字、图表进行定量描述,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考察更是如此。对于晚清云南的城市规模、职能、分布、形态及城市化、近代化水平,西方人有着和我们不尽相同的视角、观点和看法,这对于云南城市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 一、城市规模

100年前,英国学者 H. R. Davis(戴维斯)参加了英国拟在云南修筑铁路,从而联接印度和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可行性研究项目。从1894—1900年间,他先后4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调查,行程15 000英里,对沿途所经云南城市的规模(主要是人口、房屋、城池大小)有详尽的叙述。戴维斯考察的路线大致是由西向东,由中缅边境向滇川边境深入。同时,根据 L. Richard 所著 *Géographie de L'empire de Chine* (《中华帝国地理》)一书的相关数据<sup>[1]357</sup>,列出下表:

表1 西方人笔下晚清云南城市表

| 地点 | 项目 | 人口     | 房屋(栋)           | 城 墙                       |
|----|----|--------|-----------------|---------------------------|
| 腾越 |    | 11 000 |                 | 砖砌,每边大约1 200码长,30英尺高,2英尺厚 |
| 永昌 |    |        | 5 000           |                           |
| 下关 |    | 10 000 |                 |                           |
| 大理 |    | 30 000 |                 | 石头城墙                      |
| 思茅 |    | 9 000  | 城里1 300;城外1 700 | 25英尺高,周长约1英里              |
| 普洱 |    |        | 包括郊区1 300       |                           |
| 广通 |    | 250    |                 | 有几处倒塌                     |

\* 收稿日期:2010-02-20

**作者简介:**胡昊苏(1980-),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

|     |         |                     |
|-----|---------|---------------------|
| 镇南  | 500     |                     |
| 赵州  | 600     | 城区在加宽               |
| 东川  | 1 000   | 有城墙                 |
| 蒙自  | 12 000  |                     |
| 蒙化  | 1 000   | 石头城墙                |
| 楚雄  | 15 000  | 周围 7 里,2 丈 5 尺高的砖城墙 |
| 云州  | 800     | 12 英尺高的泥砖墙          |
| 顺宁  | 600~700 | 砖砌,周长 1 英里,15 英尺高   |
| 安宁  | 600     | 10 英尺高              |
| 云南府 | 80 000  | 30 英尺高,4.5 英里长      |
| 宜良  | 800     | 有城墙                 |
| 曲靖  | 1 000   |                     |
| 宣威  | 800     | 双城墙                 |
| 宁安  | 1 000   |                     |
| 龙陵  | 800     |                     |

从上表可看出,人口较多、城池较大的城市均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商业中心,如云南府、大理,或是新兴的通商口岸,如蒙自(1889年)、腾越(1902年)、思茅(1897年)。其他中小城市无论人口、房屋、城池规模均无法与这些大城市相比,基本上成为了大城市或通商口岸的二级城市或卫星城市。晚清云南城市规模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 (一)城市规模与农业发达程度成正比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数量的多寡和土地开发的水平相辅相成,人口、耕地、水源的规模是划分区域经济中心层次的主要依据,这时的区域经济中心主要表现为农业中心。自古以来,依托洱海、滇池等高原湖泊和平坝,云南形成了五个农业中心。晚清云南,以 80 万亩田地为底线,由大至小依次为大理府(1 089 678 亩)、云南府(1 031 652 亩)、临安府(993 430 亩)、楚雄府(873 632 亩)、曲靖府(861 676 亩)。每一个农业中心都有一个核心城市。这些城市总是集中在地势最低的地区,大部分位于沿湖或江河沿岸地区,因为这些地区适于航行,有利于各城市间的贸易和往来。1895—1897 年间,法国里昂商会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商业考察。他们发现,“临安坝、曲江坝、通海湖畔以及晋宁州与省城之间的坝子的确十分富庶肥沃”,“坝子里村舍众多。例如在曲江坝,十到十二里的距离内,每一刻钟我们都会路过一座村庄”。而且,“通海的人口比蒙自的多,大概有一万五至两万人”<sup>[2]36</sup>。滇西的粮仓永昌府(249 525 亩)“坝子约 18 英里长,6 英里宽,有许多村子,耕作精细,这是云南最大和最富裕的村子之一”<sup>[3]70</sup>。和戴维斯的调查比较可知,晚清云南的城市规模与农业发达程度成正比。

#### (二)城市规模与商业发达程度成正比

云南的五个农业中心同时也是商业中心:大理府、楚雄府、云南府处于川滇缅印古商道上,曲靖府处于通四川泸州的扬子江路和通遵义、百色的西江路上,临安府处于滇越古商道上。随着 1889 年蒙自开埠和后续的思茅、河口、腾越相继开关,新兴商埠体系形成,云南的经济形态体现出了近代化的特征:近代工业起步,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诸因素全面侵入。

这一时期西方人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口岸城市和传统商业城市及小城市、集镇之间商品、人员、驮马来往的证据。里昂商会记录,蒙自到蛮耗的道上,“每年竟有 87 000 匹骡马通过,繁忙季节还有牛车”<sup>[2]23</sup>。蒙自城商业繁荣,对周边农村有较大的商业辐射能力。“蒙自每五天赶一次街。街子上各式各样的服装以及附近的土著居民林林总总,蔚为大观。”<sup>[2]27</sup>戴维斯也认为“蒙自是一个繁忙的城市”,他在通海到蒙自的路上“遇上过起码有 1 000 头驮着东西的骡子,多数驮的是经香港从孟买进口的棉纱”<sup>[3]197</sup>。除蒙自外,他还认为,思茅也“是一个大的商业中心,贸易主要为茶和棉花,是从南边的掸邦运来的”。他记录思茅“很热闹”,“在南郊的大市场里到处都是来来去去的骡队”,“街道拥挤,较场上人马辐辏”<sup>[3]110-114</sup>。这一时期,法国的亨利·奥尔良亲王经法国殖民部批准,带领随从考察了从东京湾到印度阿萨姆邦之间的一片区域。他在蒙自到思茅的路上,发现一个热闹的集市,“当地居民用铁、蔬菜、装

在竹筒里的油来换汉人出售的欧洲商品、糖、丝绸、药和盐”。而且，“路上行人来来往往，有运茶和棉花的马帮，还有挑夫跟随其后，担着竹叶包裹的大担茶叶”。乡村集市里有来自蒙自的“雪茄烟叶”和“上东京湾的斜纹土布”<sup>[4]40,56,66</sup>。从腾越进口的货物则覆盖滇西地区。戴维斯总结道，大理“从八莫进口欧洲货物，但很少，主要是为数不多的棉制品、白布、木制品、针、线和罐装牛奶。还进一些藏区产品，多是毛皮货和药品”<sup>[3]80</sup>。蒙化“棉花、布和线这些来自欧洲的货物是从八莫、腾越和大理运来的”<sup>[3]114</sup>。他进一步归纳道：“（云南）不少棉花及加工产品来自四川，有棉花、纱线和布。许多曼彻斯特和印度的纱线和布是由扬子江、八莫和靠近北部湾口岸的蒙自来的，但是还有不少原棉交易是经八莫从缅甸来的，或经思茅从掸邦来的。”<sup>[3]112</sup>

与新兴口岸城市相反，一些小城市、集镇由于远离商业中心，加上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农业落后、人口稀少，对外联系程度低，阻碍了城市的发展。戴维斯发现，“顺宁城和这一地区都很穷，从破损的桥和没修好的路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儿似乎见不到一位重要的商人，骡马都很少。事实上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好像完全没有贸易，从大理到顺宁的路上我们没见到一队骡队，甚至也没见过徒步的小贩”。云州“比顺宁要大一些和繁荣一些”，“贸易不多”，“城墙有点破损”。镇南州“几乎没有贸易，许多镇南人只得受雇在别处做骡夫以谋生”。陆良是他“见过的最贫困的城镇之一”，“虽然也有一城墙，但房屋分散，树很多，几乎没有商店，人们靠每隔五天一次的集市做买卖”<sup>[3]89,90,170,179</sup>。可能调查的路线有所不同，布莱克本商会的调查认为，在 1896—1897 年间“（云南）差不多所有城镇和乡村都陷于破产”。<sup>[5]215</sup>

## 二、城市职能

城市是人口密集，具有统一便利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系统，产业、资金、技术、文化要素密集的聚落类型；是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类型，是非农产业的核心空间载体及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晚清时期，由于开埠通商，云南城市的军事职能下降，经济职能上升，行政职能则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按古汉语解释，“城市”一词由“城”和“市”两部分构成：“城”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意义的军事据点；“市”是指交易场所。

而且，在河水灌满了护城河，或者一条大河把两岸自然地隔离开来的时候，它还能够起防御作用。所以，中国古代的城市又叫“城池”。中国古代城市因具有较强的防御功能，一般下午 6 时（今 18 点）左右即关闭城门，外地客商及探亲访友、因公出差者如不能在城门关闭前进城，则须在城外住宿。因此，城郊集中了大量的客棧、马店、商铺、酒楼、茶馆、市场，有时商业活动更甚于城中。

戴维斯曾详细地描述过腾越的城墙：“有 30 英尺厚的胸墙支撑，开有射击孔”，“围绕着方形城墙的每一个城门前都有一道护墙，还有壕沟环绕”。但是，腾越“有大片开阔平坦的农田在城内，其间主要的商店和商业活动场所是在城郊”。思茅有“25 英尺高的城墙，周长约 1 英里”，“但商业区在南门外约有 1 700 栋房子的郊区”。宜良也如此，“大多数旅店和商店都在北门郊外”<sup>[3]56,57,110,177</sup>。法国里昂商会记录，进入云南府城，“就已经穿过了条条壕沟，那是云南省省会的防御工事。壕沟的顶部整齐地种植着一排松柏。在这些外围工事里的一座碉堡中还有两门由一名承担大地测量的耶稣教士在 18 世纪初所铸造的火炮”<sup>[2]40</sup>。云南府的商业也在城外，如食盐贸易集中在城外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南门附近的城墙脚下，有一个集市”<sup>[2]40</sup>。法国里昂商会总结道：“在所有城市的入口处，占绝对地位的是饭馆，供贩夫走卒光顾的民间饭馆和大众化的农家小店。”<sup>[2]41</sup>

除传统的职能以外，在约开商埠，涉外经济职能也逐步体现出来。戴维斯记载道：“自从我上次来后，思茅变成了一个口岸城市。这儿建了一个法国和英国领事馆，还建了中国海关。”<sup>[3]114</sup>蒙自最早开关，亨利·奥尔良亲王记录蒙自是“一座相对开化的城市”，“宁静安谧，但平淡无奇。居民对来来往往的白种人早已司空见惯，我们的经过也显得若有若无”<sup>[4]14,18</sup>。晚清蒙自海关的对外贸易额占到全省总额的 80% 以上。每天，“城门口处，海关前，长长的马帮骡队等在稻草或装锡的布袋子后面，轮流接受检查和卸货”<sup>[4]18</sup>。据里昂商会调查，附属蒙自海关的河口，自 1896 年起，法国就在此设立了副领事

### 三、城镇分布

聚落作为人类生产、居住、休息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分为城市与村落两大类型。由散村、集村、集镇直至小城镇、城市,是聚落演变的发展方向。除了集中在坝区和江湖沿岸的区域中心城市,西方人还对一些矿业城市、边缘城镇、边境集镇和渡口给予了重点关注,这为我们了解晚清云南的城镇分布、商品流向、城市生长提供了详实的史料。

早在 1866—1873 年,英国的探险家奥斯本就考察过澜沧江流域,并到过思茅、元江等地。在思茅附近,“他们常常遇到由驴子、骡子和牛驮着货物南来北往的商队”。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庄,“这个村庄热心地从事于从土地中提取油和盐的工作”<sup>[6]224</sup>。这个村庄很有可能就是磨黑盐井或石膏盐井中的一个,是清末云南的三大盐井之一,滇南和滇东南的食盐靠其供应。而且,在这个地区,不少欧洲产品是人们熟知的<sup>[6]230</sup>。亨利·奥尔良亲王发现,思茅附近的“迤萨镇有一千居民,商业比较发达。这里有来自磨黑镇的盐、通海的糖、经过蛮耗转运的广东烟草,还有其他元江的货物”<sup>[4]47</sup>。他还调查了湄公河上的一个渡口,“每年这里大约有 1 500 到 2 000 担茶叶”<sup>[4]88</sup>。可以说,法国人选定思茅作为约开口岸并非空穴来风,思茅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充足的水源、历史悠久的古商道、居民经商的习惯,市场辐射能力很强。

自开埠通商以后,云南进口商品的流向基本上是沿着口岸城市、中心城市、小城市、集镇、农村推进,出口商品则相反。一些位于中缅、中越、滇川、滇桂、滇藏商道上的小城市、集镇,其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一些府城和厅县。如河口和蛮耗本来只是一个小村子,开埠后成为中越边境上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和转运地。戴维斯称,“河口村约有 500 栋房子”,“蛮耗村有 100 栋房子”,“居民为广东人和掸人”<sup>[3]199</sup>。里昂商会估计“河口大约有三四千人,多为汉人和混血儿”<sup>[2]16</sup>。亨利·奥尔良亲王描述蛮耗:“河边舟船密织,桅杆林立”。逢场天,“四乡八里的居民都来赶集,热热闹闹,异常繁华”。他还调查,“蛮耗的大商人每年要从香港运回一两万包货物:有纱线、棉花、布匹、法兰绒和广东出产的烟草”<sup>[4]9,11</sup>。中缅边境的门户是蛮允。从八莫至蛮允的路上,戴维斯发现:“在冬季这条商道很繁忙,我们见到约有 500 头骡子,主要运输的是胡桃、栗子、梨、无花果干以及少量的丝和烟草”<sup>[3]130</sup>。滇藏边境的阿墩子“是一个小城市,只有三百户人家,海拔高度约 3 300 米,是进出西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门户,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贸易中心”<sup>[4]219</sup>。亨利·奥尔良亲王看到阿墩子市场上有麝香、金子、粗羊毛、茜草和铜。“拉萨在阿墩子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负责为大喇嘛寺买铜。”<sup>[4]219</sup>杨林镇介于云南府与曲靖府之间,“位于一个富庶的坝子里,是连接西江支流沿岸地区众多市场通道与东川、四川、贵阳道路的重要枢纽”,有 6 000 人<sup>[2]49</sup>。曲靖府虽为一个大的农业中心,但远离口岸城市,“贸易不很多”,“主要工业是用印度棉纱织棉布,棉纱是经香港或从西江上游的百色进口的”<sup>[3]180</sup>。

里昂商会向滇川边境进发,记录了东川城市的衰落。东川在清朝前期曾是全国最重要的铜矿产地,自回民起义后已衰败。云南府到东川府(224 203 亩)的道路“以前交通繁忙”,“现如今,马帮只走这条道的北段,也就是从四川到东川府的那一段了”。“随着临近东川,村庄越来越多,但表面上看起来都比较穷”。“东川府位于坝子东边,人口约达二万左右”,“城里唯一的工业就是制作红毛毯和供马匹用的灰毡子以及主要是云南农民戴的毡帽”<sup>[2]51,52</sup>。昭通府(561 379 亩)和四川接壤,“坐落在一片宽广的坝子里,由于它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商业和行政的中心”。<sup>[2]54</sup>其制内盐津县与四川交界的渡口“老鸦塘是云南境内的最后一个重要城镇,实际上,也是发往内地的各种货物的仓储集散地。转口贸易十分繁忙,是云南省最赚钱的厘金局。这里的常住人口估计为 12 000 人,几乎全是四川人或湖北人。由苦力、马夫构成的流动人口,来来往往,不少于 3 000 人。城里只有一条街,商店里货物琳琅满目,一间接着一间”<sup>[2]56</sup>。

上述记录让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矿业城市如东川的衰落和一些新兴城镇如河口、蛮耗、蛮允、杨林、老鸦塘的崛起。可以说,随着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集镇市场逐渐起着大宗商品集散地的作用,以至成为真正的初级市场。城市的此消彼长也反映出商业流向的变化和商业中心的迁移,进而影响到城市

的空间分布和生长轴线。各个城市生长轴线串连的结果就会形成城市群的轴线,这条轴线一般以商道、驿道、河流集束。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活动通过产品、信息、技术、人员、金融等方式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扩散的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作用于附近区域,与当地生产力要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 四、城市形态

城市形态是指城市各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布模式,它包括了空间组合的具体的物态环境和反映各要素相互关系的抽象的结构模式。城市形态反映城市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生活方式,直观的视觉感受就是城市风貌。

早在1867年12月,法国的F.安邨就到达过云南府,他目睹当时“省城之中居民约5万,城外市面极大,塌毁数处。承平之日,居民有4倍之多。城方南北长3公里,东西长2公里。门6,东2,南2,西、北各1。城东上开河,灌注壕水。墙建山麓,渐斜至湖,北倚小山。城内西北隅两山凹处,一派园田”<sup>[7]311</sup>。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则描绘了1900年前后的云南府城概貌,并手绘了一幅城市草图:“这座古城四周有约一公里长(注:此处数字不明,可能指单边长,而不是周长)的城墙,是一个巨大的正方形……这个有八万人口的城市,是一座农业城市,三分之一的面积是低洼平地,城内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和沟河纵横的水道。城外是一片片肥沃无比的稻田连着万顷碧波的滇池……城内大片大片鳞次栉比、高高矮矮的瓦房一间连着一间、一片接着一片,构成一个巨大的村庄。一条条由青石板和碎石铺筑的街巷,狭窄细长,凹凸不平,街两边店铺林立,人群熙熙攘攘,显得非常热闹”<sup>[8]109</sup>。从草图上可看出,云南府城有六个城门,东西各2个,南北各1个;城门上有城楼,城外有护城河;街道呈棋盘式布局,以中轴线对称,以鼓楼、门楼为对景,纵横有序;沿街布置牌楼、店铺,而住宅则安排在呈平行排列的小巷之中;城内尚有大片农田、菜地;官衙、寺庙、宗祠等公共建筑多处城中街衢冲要之处。这时期的云南府和其他城市一样,还是中古的城市,严守着中国古代城市严格的礼制营建制度,居中不偏,不正不威,以严整方正体现社会秩序。

由于城市是非农产业的空间载体,加上封建城市原来都是各级政权统治的中心,或军事重镇,集中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城市的手工业也主要是供城市居民消费。城市市场消费性的特点使得它特别发展了零售商业、铺坊加工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亨利·奥尔良亲王记录,“蒙化厅(295 830亩)的街市并不大,铺着石板的街道有两三米宽,商队来来往往,留下了道道痕迹。街上很热闹,正是当场天。骡子驮着盐和棉花”<sup>[4]119</sup>。大理“两条主要的大街横贯城市,一条明显是南北向,另一条向东一直延伸到了湖边……街道两边是清一色的小铺子……城里面有很多西藏的布匹,呢绒又结实又暖和”。<sup>[4]127</sup>戴维斯观察到,大理“城中多为汉人,也有不少回民”;永昌城“由北向南穿过城中心的主要集市街每天从早到晚都是人”<sup>[3]70、80</sup>。方苏雅描述云南府,“临街的门面设有柜台,顾客站在街上买东西,在一些较好的店铺则有窄长的木凳供顾客坐。可是店铺里的商品都像旧货,堆放在店外卖,有点像转卖店。饭馆、茶楼也是在屋檐下招待顾客”<sup>[8]110</sup>。那时,昆明“湖上有大的客船和货船,运输繁忙,有一条运河可直通至西门”。<sup>[3]174</sup>总体看,晚清云南城市呈现出以商业、手工业以及宗教、防卫为特征的形态,城市风貌以及城市间的距离、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方式都反映农业文明的特征。

在通商口岸如蒙自、腾越,由于领事馆、海关、洋行、邮局、铁路局的设立,城市形态开始发生变化,洋商、洋货日渐增多,城市商业重心向商埠区转移,体现出近代化特征。蒙自城区以海关为中心,整个南湖东岸是一个庞大的外国人聚居区,这里有领事馆、洋行、铁路局、酒店,还有一条以越南人为主的街道,县城的西门外也形成了一个商号店铺鳞次栉比的商贸区,集中了由中国人开办的外贸商号和各种服务业,外向型特征明显。在蒙自,洋人的办公机构、住房一般均为当地最为奢华的建筑,多为西式或中西合璧式建筑,二至三层,室内是磁砖地板或木板,设壁炉、厨房、厕所、栅栏花园、仓库、杂役宿舍、甚至小型球场。如蒙自海关的地皮和房屋造价达到16 000两白银,法国领事馆是一座高大宽敞的白色楼房,造价至少在2 000~3 000两白银之间<sup>[4]27、147</sup>。亨利·奥尔良亲王1895年到蒙自时就发现,“当地蔬菜品种

繁多,欧洲的蔬菜也应有尽有:水果、草莓、桃子、杏子、核桃都十分可口”。而且,“六天一开市,街上趣味盎然”<sup>[4]18,29</sup>。戴维斯也认为蒙自“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城里的居民特别友好,并不怎么好奇”。他还“曾在蒙自和蛮耗遇见很多法方的工程技术人员”,表明滇越铁路的“初步勘探已在进行”<sup>[3]196,201</sup>。对外人的接纳和包容某种程度上表明一个城市的近代化水平,蒙自已成为洋人愿意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有安全感。与之相比,腾越没有洋行,也没有铁路局这样的机构,对缅甸的贸易是它主要的商业特征,几乎所有的外贸都是中国商人包办,洋人很少,近代化水平不及蒙自。据1911年代领事史密斯的描述,“英国领事馆在东门外,海关的洋人住在靠近领事馆的两座房屋内,医务官住在领事馆向南去不远的街道上一座房屋内。外勤人员则住在海关建筑物里,那是由南门向南去一条长街末端的一个大院”<sup>[9]226</sup>。

总之,从西方人的笔下可以得知,晚清云南,形成不同层级、不同产业特色、不同区域要素结构、不同服务职能的城市体系。自然地理特征、可耕地面积、水利灌溉设施、交通工具、矿产资源品种和开采条件、特色商品分布、文化特征、民族宗教特点等都参与到城市的构建,显著影响城市的规模。通商口岸、传统大城市形成区域内的流通中心,经济职能得到强化。它们以其集中的交换容量和要素流动规模、综合性的商品集散内容、多功能的流通服务设施以及广泛联系的相应区域,向周围地区的市场辐射,形成经济区范围内的分层市场网络。如形成城市、小城镇、集镇、集村、散村层层扩散的市场网络。由于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交通运输条件不同,消费水平、消费习惯也不同,各个流通中心的覆盖范围有大小,辐射力和吸引力有差异。一些边境集镇、渡口、交通节点则顺应商品的自然流向,充分利用地理上的比较优势,产生强大的渗透力和扩散力,发展成为新兴的商品集散地,丰富了云南的城市格局。由于自然地理的限制,晚清云南形成滇东南、滇南、滇东北、滇中、滇西几个城市群,每个城市群里的城市、城镇、集镇、乡村通过古商道、驿道连接,成为城市生长的轴线,尽管微弱,但却可靠。社会经济要素沿轴线流动,渐次扩散,在距中心城市不同距离的位置形成强度不同的新集聚点,即新的集镇、集村。有的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居民点和城镇,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开埠通商促进口岸城市优先发展、经济要素规模聚集、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加强、城市成为区域要素流动与社会经济空间运动的枢纽,城市形态近代化和外向型特征开始显现。

#### 参考文献:

- [1] L. Richard. Géographie de L'empire de Chine. (cours supérieur)[M]. 1905.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à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 [2] (法)里沃. 晚清余晖下的西南一隅——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西南考察纪实(1895—1897)[M]. 徐枫,张伟,译注.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
- [3] (英)戴维斯. 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M]. 李安泰,等译.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 [4] (法)亨利·奥尔良. 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M]. 龙云,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 [5]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6] (英)澳斯本. 通往中国的河道:1866—1873年湄公河探险[G]//牛鸿宾,译. 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集刊. 1990.
- [7] 申旭. 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M].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
- [8] 李开义,殷晓俊. 彼岸的目光——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
- [9] 胡滨.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 张颖超